

犹太民族与城市空间^{*}

陈红梅

内容提要 犹太民族在近两千年流散历史中主要生活在各国城市里,具有丰富的城市生活体验。城市的便利交通和繁华商业为犹太人提供了藏身空间和发展资本经济的机会;异国城市生活促进了犹太教义知识化和系统化,其流散时期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既保存了自身的文化优势,也广泛吸纳其他文化的精华;同时,城市空间的匿名性带来的宽容让经历了纳粹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疗治创伤时较少受到干扰。作为人类文明聚集地的城市具有许多对立的特性,也形塑了充满悖论的独特的犹太民族特性。

关键词 犹太民族 城市空间 大屠杀 民族身份 民族特性

城市文明带来了人类加速度的发展,集中了人类最重要的优秀资源和成果。德国学者斯宾格勒认为“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的事实,但此前谁也没有认识到……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以及各种科学都以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市镇,为基础。”^①因此,一个民族要对人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无疑需要经历甚至驾驭城市文明。犹太民族虽然只有1390万左右人口,^②却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犹太民族在长达1800余年的时间里失去了国土,流落到世界各地,生活在各国主要城市,这使得城市成为犹太民族的主要生存空间。但是作为客居他国的边缘民族,其城市体验与本土民族有着巨大不同。城市生活无论是对犹太民族的集体身份还是个人感受,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但学界对二者的关联却缺乏研究。城市生存样态是犹太民族特性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犹太民族。本文拟从犹太民族的经济和文化集体身份以及大屠杀后创伤疗治三方面探讨城市空间对犹太民族的影响并重新获取对城市空间的认知。

一、犹太民族与城市

尽管发端和表现形态各异,总体而言,城市是人类及其生活要素在一定空间的大规模汇集。著名城市社会学家凯文·林奇在回顾城市发展的各种样式后总结了城市的六个特征:(1)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2)城市是各种社会人群的共生体;(3)城市是物资资料生产和分配的地方;(4)城市是一种社会的场;(5)城市是各种社会力量决策的产物;(6)城市是社会矛盾冲突的地方。^③但仔细甄别后可以发现,第(2)、(4)是关键因素,其余四条皆为这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因为人的聚集促进物质的生产和消费,也因为人在有限空间的大量积聚,人际联系(包括冲突)紧密

* 本文受“2016年度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项目号:2016-50)项目资助。特此鸣谢。

①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99—200页。

② *Th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2014, Dordrecht: Springer, pp. 212 - 283. qtd. from “Vital Statistics: Jewish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s/Judaism/jewpop.html> (accessed March. 24, 2017).

③ 转引自张鸿雁主编《城市·空间·人际——中外城市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多样,因此,空间和人的聚集是城市出现的必要条件。然而,人群聚集一地,必须要有便利的交通以运送人流和物质,因此,早期的城市常位于河口港湾或通衢汇聚之地,当今世界大都会亦莫能除外。

尽管交通便利是形成城市的现实条件,城市研究学者因其关联性小而不予关注,但这对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来说却至关重要。公元6—135年,犹太民族为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先后发动两次“犹太战争”抗争,均被罗马军队镇压。第一次“犹太战争”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掳至以色列以外的地区,更多人向外地流散,第二次“犹太战争”中至少有159万以上犹太人惨遭屠杀,无数村庄被毁,幸存部分被迫逃散,犹太民族主体进入流散时期。^①

在流散初期,犹太民族主要逃亡到地中海沿岸、西欧、两河流域的城镇及其周边地区等有利于发展之处。到公元619年,大不列颠列岛也有了犹太人。^②中世纪初期,基督教兴盛之前,犹太教尚被容忍,犹太人活动未受到严格限制,从事包括农业在内的各行业,带来了两河流域较高的手工业和商业技能及一系列文明成果,^③推动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犹太人流散到城镇,主要因为其坐落在交通便利之处,便于迁徙。中世纪中后期反犹迫害横行,犹太人寄居的城镇对其宽容友好时,他们就繁衍繁荣;迫害加剧时,他们则四散逃命,从一个城镇流落到另一个城镇。城市集聚的大量人口为犹太人提供了赖以藏身的空间。1845—1851年英国犹太人人人口大约为3至3.5万,其中2.5万居住在伦敦。^④据统计,1933年德国有犹太人大约50万,近71%聚居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其中,近一半城市犹太人生活在柏林,而普通人口只有30%生活在城市,^⑤其城市化率远高于其他民族。

流散历史上,犹太民族先后形成过亚历山大城、古巴比伦、维尔纽斯^⑥和纽约等城市文化中心,代表了不同地区和历史阶段的犹太文化,呈现出历史空间化的特点。至19世纪末,大部分西欧犹太人居住在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等地。^⑦东欧经济相对落后,城市化速度稍慢,又实行犹太人在指定区域居住的政策,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聚居在波兰华沙和罗兹、俄国敖德萨和勒沃夫等城市。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沙俄政府借此纵容对犹太人的清洗,东欧犹太人开始了持续四十年之久的迁出大浪潮,大部分移民就此远涉北美,形成以纽约、蒙特利尔等大城市为中心的犹太社区。小部分东欧犹太人迁徙至巴勒斯坦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东欧犹太人蜂拥而入到以色列建国,该地区城市化率从25%增长至50%,至2001年更高达91%。^⑧无论是客居还是在以色列,犹太民族都是高度城市化的民族。

二、城市空间与经济长才

长期的城市生活塑造了犹太民族长于商贸的集体身份。城市突破了乡村的自给自足,聚集一地的人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工商贸易是城市的基本功能。马克斯·韦伯在其《城市》一书中写道“城市就是市场,而这个当地市场是某一群体的经济中心。”^⑨在韦伯眼里,城市的经济功能先于其政治角色。犹太人在流散过程中利用城镇贸易生存下来,并抓住与宫廷或政府合作、战争、经济转型等机会发展壮大自身。但犹太人在西欧与东欧所走过的路径不同。在西欧,

① 徐新著《犹太文化史》(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30页。

②③ (美)威尔·杜兰著,台湾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第4卷),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295,299页。

④ Cecil Roth,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 267.

⑤ Ezra Bennathan, “Die demograph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Struktur der Juden,” in Ezra Mendelsohn (ed.) *People of the City: Jews and the Urban Challen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2.

⑥ 立陶宛语: Vilnius, 波兰语: Wilno, 亦译作维尔纳,立陶宛首都,中东欧重要的犹太文化中心。

⑦ Ezra Mendelsohn (ed.) *People of the City: Jews and the Urban Challen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vii.

⑧ 参见徐继承《以色列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因素》,载《安徽史学》,2011年第3期。

⑨ Max Weber, *The City*, Don Martindale and Gertred Neuwirth (trans. and ed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8, p. 67.

犹太人被逐步剥夺拥有土地、从事农业的权利,被迫退守到城市从事商业、手工业和金融。公元438年,罗马帝国《提奥多希法典》把犹太人排挤出军政和工业部门;随着基督教统治地位确立,教会法规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和加入行会,犹太人只能经商,特别是基督徒鄙视的高利贷业,因为初期基督教认为不生产有形物质的商业和金融是不道德的投机,禁止其信徒进入,外来者犹太人填补了社会需要。^①另外,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约法广泛实行,客居的犹太人不得不花费巨额金钱向掌权者购买居住特许,寻求保护,因此成为被统治阶层利用和讹诈的对象,这迫使犹太人奋力追求财富以便应对不时之需。求取金钱成为犹太人谋取权力的手段。犹太民族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还处于奴隶社会时就进入城市,从事本地人不愿意从事的金融和贸易,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

但是绝大多数犹太人在城市的生存并非世人瞩目的巨富那样成功,实际上,大部分被主流社会排挤剥夺的客居者是微贱的商贩、走卖商、出卖体力者甚至流浪汉。17世纪中期,重新定居英国伦敦的犹太人除了少部分西班牙葡萄牙塞法迪商人比较富裕外,其他的塞法迪和绝大部分中欧各国的阿什肯纳兹人因为所在国的活动限制、经济剥夺和宗教迫害而异常贫困,甚至无法支付迁移费用。由于自身经济状况的不同,城市犹太商人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大相径庭。无论是塞法迪支系还是阿什肯纳兹支系,犹太富人来到伦敦等地主要是拓展家族业务,多从事海外贸易、奢侈品销售和高利贷或股票等金融行业。缺少技能和资源的犹太贫民选择有限,但城市提供了巨大的底层交易机会,大多数普通犹太人贩卖橘子、纽扣、眼镜等日用品或廉价的水晶、珊瑚、手表和珠宝或者旧衣服等价格低廉、质量低劣的商品,其行商地位和口碑均不为人道,一是商品不吸引人,二也因其执拗的兜售,^②甚或图谋赃物价低利大而被卷入犯罪集团。^③此外,还有部分犹太人掌握了某种手艺或少量资本,或者成为小店主,或者是制造铅笔、玻璃、珠宝和服装鞋帽等手工业者,^④20世纪之交美国纽约和新泽西诸多服装和皮革血汗工厂吸纳了数量庞大的东欧犹太移民。^⑤由于犹太人坚强的求生意志,也由于其长期的艰苦努力,再加上时代发展赋予的机遇,犹太人不断改善经济状况。走卖商有了自己的摊位,小店主发展为批发商或百货商场老板等,手工业者成长为制造商。其中不乏像梅耶·罗斯柴尔德(Mayer Rothschild)之类,以流动金匠和放贷人的出身,凭借几代人的聪明和勤奋,与普鲁士宫廷合作,抓住战争和国家经济转型的机会,创立金融帝国。181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仅坐镇巴黎、伦敦、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等中心城市,就牢牢控制了欧洲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在伦敦年度工商人名录上,1774年只有7个犹太人,1808年有17个,在1815年增加到41个,”^⑥到18世纪末期,除罗斯柴尔德家族外,沃伯格(Moses Marcus Warburg)和沙逊(Sassoon ben Salih)等家族也是当时世界上具影响力的犹太人。城市商贸经济在时间效应的作用下对犹太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与马克思辩论的鲍威尔抱怨,犹太人在维也纳虽只被容许存在、在德国哪怕最小的城邦中也毫无权利,却凭借拥有的金钱实力决定着奥匈帝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命运。^⑦

在东欧,犹太人同样受到歧视和压迫,但形式各异。18世纪末起,沙皇俄国对本国边疆及被瓜分到手的波兰和立陶宛等的乡村犹太人施行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政策,将其固定在土地上,造成经济贫困不堪、文化孤立隔绝的东欧犹太群体。其后,为了发挥犹太人的经济和社会作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59年至1879年先后多次发布命令,允许犹太商人、手工业者、大学毕业生和

① 徐新著《犹太文化史》(第2版),第306—307页。

②③④ See Todd M. Endelman, *The Jews of Britain, 1665—2000*,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73—75, 77—85, 75.

⑤ 详见(美)欧文·豪著,王海良、赵立行译《父辈的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78—82页。

⑥ David S. Katz, *The Jew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1485—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15.

⑦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2—193页。

退伍军人等“有用”阶层到栅栏区之外居住。首都圣彼得堡等城市以其所谓的先进(可以读大学)和商业性(有利于钟表匠推广其新产品)等吸引了这些被“选择性解放”的犹太人。来到彼得堡等城市的犹太人绝大多数从事手工业和小商贩,但也有许多人在由雇农经济向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离开栅栏区的税款包收入变身为银行家,承包商成了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犹太银行家在1860到1880年代沙皇俄国国家信用重建期间在金融领域起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和格申·布莱赫罗德(Gerson Bleichröder)家族在德国的作用。^①其中,最瞩目的是金兹伯格家族,埃弗泽尔·金兹伯格(Evzel Gintsburg)及其儿子霍勒斯(Horace)依靠其酒税包收和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向军队提供被服和货物的经营积累,1859年在彼得堡开办了银行,随后向政府的许多重要项目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贷款,包括1877—1878年与奥斯曼帝国战争的贷款。波利阿科夫(Polyakov)三兄弟因为修筑铁路做出的巨大贡献,亚历山大二世授予其世袭贵族爵位。尽管犹太人大规模移民美国时间较晚,但在平等自由开放的制度中,由于熟谙资本运营和城市生活,在20世纪初20及30年代美国城市化和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利用后发优势,抓住机会在金融、房地产和电影等重要或新兴行业快速地取得了比其他少数族裔更令人瞩目的成功,^②在所居留的国家刻下了不可抹杀的印记。

三、城市空间与文化成就

城市既是人类创造的结果,也是创造力的聚合。文化符号、管理制度、思想艺术无不在城市中得到极大推进。城市生活的这种文化功能增强了犹太民族的智慧,树立了其流散生活的文化模式,强化了其智慧民族的集体形象。公元前六世纪“巴比伦囚虏”期间,由于新巴比伦王的宽容,被囚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并没有被奴役和监禁,而是集中居住,继续其宗教生活,甚至学习巴比伦当地更发达的文化。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远离家园,思乡促使其思考如何在异乡生活中保持自身文化的方式,编撰了《巴比伦塔木德》,系统总结了异域环境中践行犹太宗教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力超过本土的《巴勒斯坦塔木德》,成为通用版本。巴比伦犹太社团的自我管理和文化传承方式为犹太人后来的流散生活树立了范本。此后,犹太教作为犹太人的民族信仰不再依靠圣殿祭祀维系,研习《托拉》和《塔木德》等经典成为践行犹太教的核心。犹太教义对从屠宰牲畜到饮食等生活各方面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做犹太人(包括外族人皈依)需要接受训练和考核。因此,现代之前,以犹太教为生活方式的犹太民族注重经文诵读和教义研修,其成员知识普及度和水平比同时代其他民族高出许多。

城市生活不仅突出了犹太人的崇智特征,而且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提供了吸取其他文化长处的便利。城市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城市突破了乡村的封闭和自我陶醉,实现了作为传播者和流传者的最高功能。^③在芒福德看来,外来者、流浪汉、商人、逃难者甚至奴隶等各色人等在城市流动都有助于城市超越了乡村生活的褊狭。城市大量的文化资源吸引着犹太人。非法居留彼得堡的犹太人在被警察驱赶强制离去时留恋的是办公室工作、朋友圈、附近的图书馆、每日更新的报纸、剧院等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④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为了生存,特别容易接受所处环

① Benjamin Nathans, “Mythologies and Realities of Jewish Life in Prerevolutionary St. Petersburg,” in Ezra Mendelsohn (ed.), *People of the City: Jews and the Urban Challenge*, p. 117.

② 详见(美)杰克·罗森著《犹太人的大梦想》,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

③ 详见(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等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102—104页。

④ See Gershon Lifshits, “Ispoved’ prestupnika. Iumoristicheskii rasskaz iz zhizni peterburgskikh evreev (Petersburg: 1881),” in Ezra Mendelsohn (ed.), *People of the City: Jews and the Urban Challenge*, 1999, pp. 108–109.

境中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文化,吸收主流异质文化的养分,消化并加以提升,在知识创新上占据优势。迁居世界各地的经历培养了犹太人多种语言能力,赋予他们多重文化身份和开阔的跨文化视野,在比较和鉴别中便于发现新的空白。另外,长期处于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浸染之中也有助于犹太人掌握国际社会话语的主流表达机制;进入主流社会的犹太人甚至操控和影响话语权力,美国犹太人强有力的院外活动即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同时,城市聚集的大量人口、多样的经济形式以及由此突显的社会问题也为学术思考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对象。具有深厚学术传统的犹太人敏锐地关注到人类生活在资本和城市转型之后出现的社会、经济、心理等问题,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仅举一例:如果弗洛伊德不搬迁到维也纳就不可能接触到那么多亟须解决心理问题的中上层病人,就不可能创立其精神分析学派。

城市聚集和生发各种文化资源,吸引着崇尚智慧的犹太人,犹太人也显著地改变了城市的文化风貌。亚历山大二世解放的大学毕业生在圣彼得堡等城市从事法律、银行、新闻等工作,为首都等现代大都市带来了开放性并增添了专业色彩。在全世界的城市中,犹太人的贡献最为突出的是纽约——犹太人的“应许之城”。20世纪之交东欧大移民以及二战中逃避纳粹迫害的移民使纽约成为北美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战后50年代末期,大约210万犹太人生活在纽约,占纽约人口的27%,但是犹太学生占据纽约公立学校学生的33%,45%的教师是犹太人,大部分学校校长也是犹太人。^①在大量犹太人口充分利用纽约城市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涌现了一批思想深刻、从事社会和文学批评的公共知识分子——“纽约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大多从东欧移民到美国,带来了激进的社会民主思想,在免费的纽约城市学院完成本科教育。他们在自由环境的熏陶下,成为思想界和文坛的风云人物,影响美国和全世界的思想界和政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为世界文明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更多在纽约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普通犹太人进入到以《先锋》杂志等为代表的出版业、新闻、广告、交响乐、戏剧等各种知识性强的创新小公司,由城市文化资源的享用者变身为创造者,在纽约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都市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至今,犹太人从事科学、文化、艺术行业的人口比例与其所占世界人口比例相比高出许多,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等世界主要奖项的人数比例在各民族中独占鳌头。据统计,犹太人占据诺贝尔获奖人数的21.226%,^②美国国家科学奖的获奖比例为38%,日本“诺贝尔奖”京都奖的获奖比例为25%,在菲尔兹奖中的获奖比例为27%,^③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杰出成就者有如:政治家基辛格、社会学家涂尔干、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李嘉图、科学奇才冯·卡门、“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等等。这些学界翘首的知识贡献跨越了学科领域,举世瞩目。

四、城市空间与创伤疗治

城市有限的空间里汇聚了数目庞大的人口,人际交往的性质和层次都发生变化。首先,血缘关系弱化,城市中人们因事连接,建立在契约关系上,契约完成则关系解除,人际交往浅表短暂,人们就事论事,人际关系疏离感增强,难以深入到情感和精神层次。其次,地缘关系淡漠。城市人多地少,普通人群集中居住,高层公寓住宅缺少居民互动空间,比邻而居的住户浑然不识,人们只有在生

① See Morris Horowitz and Lawrence J. Kaplan, *The Jewish Population of the New York Area, 1900—1975*, New York: Federation of Jewish Philanthropies of New York Demographic Study Committee, 1959, pp. 14—16.

② “List of Jewish Nobel Laureat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Jewish_Nobel_laureates

③ 周飙,《犹太人为何拿了这么多诺奖》,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14日期,第3版。

活轨道重合的场所才接触,乃至同一社区居民严重隔膜。现代社会,通讯网络方便人们与相距遥远的亲朋联系,这又减少了人际交往的日常实践。同时,城市的海量物质带来巨大的诱惑,大多数市民追求物质享受,生活以赚更多钱财换取更多消费品为目的,而城市人格的理性和算计特征^①也让人们只愿意把时间花在有利可图的事项上,对无关自身利益的事项漠然置之。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之下,大街上熙熙攘攘充斥着的是“孤独的人群”。城市生活具有匿名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社会关系冷漠,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人们把城市生活等同于人际关系异化,向往回返到前现代紧密的联系中。然而,正是这种冷淡的城市环境给纳粹屠犹的幸存者提供了少受干扰医治心灵创伤的空间。

学界对纳粹屠犹这一骇人事件的政治、社会心理、记忆和艺术表现都有研究,^②刻画大屠杀的艺术作品表现了大屠杀对个体的冲击,但都忽略了幸存者个体的创伤治疗,更未注意到不同空间产生的不同际遇。大屠杀幸存者主要逃亡到巴勒斯坦和北美,尽管都不被当地人理解接受,但个体感受大相径庭。纳粹屠犹幸存者来到巴勒斯坦,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犹太教戒律规定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必须回到巴勒斯坦故土,践行这一戒律被认为是人生最大的功德,因此流散犹太人素有回归祖地的传统。然而,相当多幸存者被迫离开祖辈生活的欧洲城镇来到巴勒斯坦,面对迥异的艰苦拓荒环境,他们孤立无助,加上语言障碍,只能沉默。同时,巴勒斯坦本地长大的犹太人或复国主义者无法理解幸存者因被迫害留下的怪异行为,难以接受他们,因而这些大屠杀幸存者生活在隔离之中。复国主义者主张建立与土地的联系,倡导集体和奋斗等主流价值观念,严苛的生存环境也迫使人们坚忍不拔、奋力求生,但是习惯了欧洲城市生活的幸存者既缺乏对土地的情感,也缺少在土地上谋生的技能,经历了战争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后,^③也难以树立乐观的生活态度,因而在农场劳动成为另一种苦难重负,特别是青少年幸存者,往往借酗酒打架来发泄。^④而且,在1961年公开审判纳粹头目艾希曼——艾希曼审判(the Eichmann Trial)之前,以色列政府强调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认为参加过犹太区起义或反德游击队的抵抗者才是“正义之士”,幸存者被视为软弱无能之辈,其苦难只是被用来获取赔偿,幸存者本人却被敬而远之。这些因素使得来到巴勒斯坦(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幸存者不仅没有治愈其创伤,反而背负了新的屈辱。

1945至1952年间,第一批13.7万纳粹屠犹幸存者到达美国和加拿大,这一批幸存者中只有1000人从事农业,占2.8%左右,其他幸存者大都在纽约、西雅图、巴尔的摩和芝加哥等大都市藏身或被安置在那里。^⑤大屠杀幸存者来到美国也遭遇不被接受理解的窘境,但是由于地域不同,其境遇也不相同。战时美国政府和社会对纳粹屠犹和援助犹太难民态度暧昧,美国犹太社团对同胞救助不力,这些都在战后遭到各方严厉批评,因此对纳粹屠犹的幸存者,人们也因其敏感噤声不语,这种冷淡的氛围让幸存者心寒。但是,与到巴勒斯坦的幸存者不一样的是,社会制度和城市的宽容免去了他们许多不必要的困扰。城市生活的匿名性提高了宽容度,幸存者们不用担心众口铄金,也不用担心被钉在耻辱柱上,更不要说他们根本无心所犯的错误,如果面对暴政奋力求生算是错误的话。幸存者蛰伏在大城市的犹太聚居区或其他角落,“喜欢独立进行经营活动,而不在意收入的高低,”^⑥不愿回忆战争留下的创伤。绝大多数幸存者失去了亲属,在孤独中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让时间医治创伤。由于战争造成的混乱,一部分与亲人失去联系的幸存者以为配偶已经去世,组成

① 详见(德)格奥尔格·齐美尔著,涯鸿等译《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58—264页。

② 详见时春荣《“大屠杀”对以色列犹太人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2期;钟志清《“艾赫曼审判”与以色列犹太人对大屠杀的记忆》,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4期;王炎《犹太大屠杀的话语演变与影像观念》,载《艺术评论》2009年第6期。

③ 详见张倩红《后大屠杀时代:纳粹屠犹的社会后果分析》,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

④ 详见钟志清《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与幸存者作家》,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⑤⑥ 详见(美)威廉·赫尔姆赖希著,时春荣摘译《“大屠杀”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载《民族译丛》,1992年第6期。

新的家庭,但是多年之后失去联系的配偶又找到他们,这些人又受到内心的道德拷问之中。落入这种境地的幸存者不忍心拒绝同样遭受苦难的前任配偶,不得不将他们安排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回避邻里,费心安排日程以照顾好帮助自己逃脱纳粹魔爪的恩人和需要自己照顾的亲人,借助城市的便捷交通周旋于恩情和亲情之间,整日生活在谎言当中。^①现实比虚构更离奇,这种状况发生在不少幸存者身上,只有城市能够让他们愧疚地和同是大屠杀受害者的亲人艰难地生活下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的人数减少使得其经历越发宝贵,艾希曼审判也使犹太民族意识到应与幸存者一道借受难经历共同建构一个精神领地,每一个幸存个体的经历都是民族整体对大屠杀的共同记忆,因而在美国华盛顿等犹太人聚集的城市建设各种大屠杀纪念馆,丰富了城市的空间和城市记忆的内涵。在这个过程中,犹太民族曾不公正地对待过纳粹屠犹的幸存者,而城市空间的人际疏离在一定程度上疗治了幸存者的身心创伤。

结 语

失去国土使犹太民族成为世界上最早城市化的民族,流散到其他国家的城市生活既培养了其优异的资本经济能力,强化了崇智气质,也使之付出了承受反犹主义迫害和屠戮的代价。城市是物质和思想靡集之处,各种样式的人类文明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因而集中地放大了其优缺点。城市具有矛盾性,犹太民族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特性的民族。历史学者顾晓鸣先生的专著《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集中探讨了犹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诸多矛盾之处,在顾先生看来,犹太民族的悖论特性在于民族精英将其文化实践固着于《圣经》这个文化内核之中。^②此论断击中了犹太民族文化传统和传承的要害,但这只触及到犹太特性形成的内在要素;从外部条件看,犹太民族率先完成城市化,在充满悖论的城市空间里生存发展、演化其民族身份也可以说是其民族特性形成的重要原因,城市还给多灾多难的犹太人提供了治疗创伤的空间并赋予了其有异于其他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诸多特性。

Abstract Jewish people had, in the Diasporic history, lived mainly in cities and towns across the world, which have provided them with an abundance of urban experience. The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 prosperity of commerce that the city offers have bestowed the Jews with habitation and opportunities in a capitalist economy. Life in foreign cities has helped them intellectualize and systemize their Judaic decrees. The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the Jewish people have been practicing in Diaspora work well in preserving their ow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in absorbing strengths from other cultures around the globe. Meanwhile, the anonymity of urban life has furnished Holocaust survivors with potential to recover from trauma without much disturbance. The city, as a hub of human civilization, shelters many opposing features and has fashioned the unique and paradoxical nationality of the Jewish people.

(陈红梅,文学博士,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37)

(责任编辑:周旭芳)

^① 详见(美)艾·巴·辛格著 杨怡译《冤家:一个爱情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

^② 详见顾晓鸣著《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